

侍從所見的中山先生

張其昌

編者先生：我們是一羣中外雜誌的忠實讀者，由於遠在海外，每一個月收到中外雜誌，恆在中外雜誌出版一兩個月以後，而且在此間很難買到前期的中外雜誌，有好些佳作，輒以殘缺不全，不克窺其全豹為苦，前幾天我們有一個例行的小聚會，大家不約而同的談起此一遺憾，於是就有人「忽發奇想」，但願寫將出來不致為先生所笑，而且更進一步的希望先生能够應允我們的要求。

因為我們急需中外雜誌第三十九期至六十期，一共有二十一本之多，一方面不知道貴社是否還有存書，另一方面又不知道書價一共若干，彷彿中外雜誌一再增加篇幅，已經加過幾次價了。所以我們特地找到了一篇紀念國父的好文章，國父侍從馬湘所撰「跟隨國父十餘年的回憶」可能中外雜誌未曾登過，特地推介紹給中外

雜誌，如果先生認為可以採用轉載，那麼，便請先生付給我們一點小小的酬勞：將上列那二十一本中外雜誌用平郵寄給迫切需要閱讀的我們，那就不勝感謝之至了。倘不合用，原件請不必退回，免得給中外雜誌的先生女士們添加麻煩。不知先生高見以為如何？

加拿大溫哥華讀者張其昌等上

中外雜誌的答覆是：

推介之文甚為精采，愛護中外雜誌的盛意尤其可感，因此我們欣然照辦。

中外雜誌編輯部

馬湘·你是我的世侄

我第一次得見孫中山先生，是在美國的巴塞。我是廣東省新寧縣（今台山縣）人，少年失學，十五歲即離開家鄉，到美洲墨西哥謀生，在

一間外國人開設的餐館傭工，後又轉到美國巴塞的一個農場做工。一九〇九年，中山先生來巴塞從事革命活動，受到當地大部份華僑尤其是致公黨的熱烈歡迎。中山先生在由當地華僑領袖和致公黨首領召集的華僑大會上發表演說，把清朝入關壓迫殘害漢人的史實，以及種種昏庸腐敗的情況，對到會羣衆作了詳盡的敘述，並指出我們中國眼見就要被列強瓜分共管，全體同胞必須立刻起來推翻清朝，才能挽救危亡。這次演說足足講了三個多鐘頭，言下義憤填膺，慷慨激昂。聽講的人個個都非常感動，我也激動得流下淚來，恨不得立即回國去和清政府拚個死活。

當天晚上，華僑團體公宴中山先生，我也參加了。入席時，各華僑領袖和致公黨首領紛紛簇擁着中山先生，推他坐首席。我看見中山先生就座後，立即跑到他跟前，很恭敬地叩了一個頭說：「我要跟隨先生革命，替先生挽皮包。」中山先生說：「革命？革命是會殺頭的，你有這個膽量？」我答道：「殺頭？殺就殺，我不怕。我同胞兄弟三個，殺了我，還有兩個兄弟侍

奉父母；我又還未娶妻，沒有子女，怕什麼？」
中山先生說：「好，好！你有這樣決心參加革命，很好。但你替我挽皮包，我却沒有給你工資啊！」

「接着又說：『我可以寫信介紹你到日本找陳少白、廖仲愷和朱執信等人，跟他們做革命工作。』
「我得先生允許我參加革命，高興異常，就準備

搭船往日本。有一天，我往見先生。他告訴我，將要往加拿大聯邦華僑，鼓吹革命。這時我的父親馬厚庶在加拿大溫哥華經營商業，是加拿大洪門（即致公堂）首領，也是當地華僑領袖，可以助中山先生一臂之力。因此，我把父親在加拿大的情形告訴先生，並寫一封介紹信，請他到加拿大時找我父親。

我在美國巴塞拿到先生的介紹信，正欲到日本去見廖仲愷、朱執信和陳少白等參加革命時，不料美國政府在巴塞大捕沒有出生證的華僑，有三百多人被捕驅逐出境，用船送回上海，我也是其中之一。船過日本時，因被驅逐出境的一律不准上岸，我既不能登岸，只得到上海後轉回家鄉。我在家鄉住了兩年以後，又到加拿大的愛孟頓，在一個農場裏僱工，每日不是耕田就是打獵。我乘機苦練射擊，不到兩年工夫，發槍沒有不中的了。

一九一五年冬間，一天早上，賣報紙的人特別喊得起勁，買報紙的人也特別踴躍。原來報上發表消息說，袁世凱要做皇帝，中山先生號召華僑



孫中山先生伉儷合影，時在民國十三年冬，北上會商國是時途經神戶所攝。此幀照片為國內所罕見，極為珍貴。

回國參加討伐袁世凱。我便決意回國，實現我跟隨中山先生革命的志願。隨後又得知中山先生派夏重民胡漢賢組織華僑敢死先鋒隊，在域多利埠的新民報館設立機關，並由胡漢賢和蔡鶴朋在愛孟頓成立一個軍事社，進行訓練。我便和黃惠龍一齊報名參加，總計參加的共有五百人。我恐被父親知道，受到攔阻，報名時化名為黃升。

討袁敢死先鋒隊成立了不久，奉中山先生電召開往日本橫濱訓練；過了五個月，又從日本橫濱調到山東濰縣周村。各隊員都沒有槍枝，只配備四個炸彈，在對襟衫上標着「華僑敢死先鋒隊」幾個大字。當時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是居正，副司令是許崇智，華僑義勇團團長是夏重民。我們在濰縣訓練，正要出發進攻山東省會濟南的時候，袁世凱突然死了。華僑討袁敢死先鋒隊奉中山先生電召，開往上海集中。我們叁百個隊員到了上海後，都住在徐園招待所。中山先生親來慰問，並對全體隊員演說，一連講了四小時，散會後又在張園歡宴全體隊員。後來他又派廖仲愷到徐園慰問各隊員，並發給每人大洋三百元。當時我用不着這麼多的錢，因此就沒有要。

廖仲愷來慰問時，問起我的姓名。我說：「我原名馬湘，在加拿大愛孟頓參加敢死隊時，是用化名黃升報名的。」廖仲愷答道：「中山先生叫我來找你。」他還說：「演講時看見一個人身材不高，好像是在美國巴索會過的馬湘，如果是他，帶他來見我。」現在請你隨我去見中山先生吧！」我聽說之後，十分高興，便隨着廖仲愷到環龍路六十三號中山先生的寓所去。

中山先生一見面就指着我說：「你是馬湘吧？我在美國巴索見過你。你昨天很用心聽我演說，我估計一定是你了。我和你父親馬厚庶是舊好，你是我的世侄，你來了很好，就住在這裏吧。以後見我不可不用通傳。」我很愉快地答應了，便退出來。

我奉命之後，馬上從招待所搬來中山先生的住宅裏。從這天起，我就跟隨着先生，先後擔任衛士、衛士隊長和副官等職務，一直到先生在北京逝世為止。先生在上海居住時，原來擔任衛士職務的只有馬伯麟一人，自我到來後，便有兩個人。

西裝大衣換三個字

孫中山先生住環龍路六十三號，馬伯麟、朱執信、廖仲愷和我都一起住在這裏。對門四十四號是辦公的處所，也是陳少白和秘書連聲海的寓所。經過兩個月後，有四位旅美華僑來見先生，出門時拉着我談話，問我姓名，接着便說：「孫中山先生住的房子太不像樣了，是他自己的麼？」我答道：「不是他自己的，他那裏有房子？這房子每月要付出租金六十五元。」他們齊說：「世界上只有孫中山是好人，那裏有做過驚天動地大事業的人，連住的房子也沒有呢？我們一定要替他想想辦法。」他們說完之後就走了。

原來這四位歸國華僑，集合了許多股本，準備在上海開化妝品工廠。他們自從見過先生，知道先生還是租房子住，便開了一個股東會議，提議拿出一筆錢購置一所像樣的住宅送給先生。各股東都一致贊成，就買了莫利愛路二十九號一所住宅，一切傢俱陳設以及花園裏的花木和網球場等都佈置得很整齊美觀。於是他們再來拜訪先生，並說明來意。中山先生說：「送房子給我麼？不可！不可！我怎能接受你們這樣重的禮？」經過他們十分懇切的勸說後，先生覺得不好推辭，便從環龍路遷到這所新房子來。

先生每天的生活很有規律。清晨起床後常常和夫人在花園打網球。早餐後就開始辦公。他常常和朱執信、廖仲愷、陳少白等聚談，又喜歡與章太炎等研究學術。晚上多是閱書、讀報，或是寫作，每每至夜深十二時才就寢。

那四位歸國華僑創辦的上海化妝品工廠開幕時，他們請先生蒞臨指導。先生到廠參觀後，對各創辦人能夠回國興辦實業極為嘉許。他還對職員工人作了演講，大意是說：「中國實業極為落後，即如此種化妝品工廠，本來不需很多資本，機器亦不複雜，但經營此種工業者仍不多見。」他勉勵各股東和工人，爭取更多的海外同胞回國興辦實業。全體員工聽了都非常興奮，鼓掌之聲常常把先生的演說打斷了。後來全廠員工都加入國民黨。

那時在北四川路有一家廣東館子叫趣樂居，生意十分發達。經理孫陸洪與先生同族，他曾介紹過五十餘人來見先生。後來這五十人都加入了國民黨。我和孫陸洪相熟以後，便勸他把趣樂居的贏利撥出一部份來組織一個工界協進會，並開

辦工人子弟學校、醫務所，使工人子弟有書讀，患病能治療。我隨將這個意見告知先生，他認為很對。後來孫陸洪請先生到趣樂居吃飯，並把我勸他組織工界協進會的事告訴了先生，並對先生說，他本人也很願意這樣作。先生對他極為嘉許，並請他從速進行。不久，這個工界協進會便成立了。

上海廣肇公所，產業極多，由溫宗堯、劉維熾和陳興漢三人為公所總理。他們入息甚豐，維持個人生活豪奢，而且往往巧立名目，將公款隨意開支，宴會頻繁。先生爲了糾正他們的錯誤，特把他們請來談話，指出他們各人都有很多收入，在社會上很有地位，不應濫用公款；要他們將公所的公款辦幾所中小學校和醫院，不特使在上海的廣東人的子弟都有讀書的機會，其他外省學生亦可一並招收；有了公醫院，貧苦病人就可以得到治療。先生並進一步對他們說：「趣樂居一家商店就能組織工人協進會，創辦一些社會服務事業，你們應該很好仿效。」不久他們就遵照先生的指示，把中小學和醫院辦了起來。

先生的生活非常儉樸。他家裏平日有好幾個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不超過二元。有一次唐紹儀來訪，暢談之下不覺已至中午。先生留他午飯，吩咐我去趣樂居買了一只鹵水肥鷄來待客。唐紹儀很快就把鷄吃完，還以爲尙有其他餚饌。中山先生見他還在等待上菜，便說：「簡慢得很，沒有什麼好的菜款待。」又問我說：「馬湘，還有什麼菜？」我答道：「廚房裏只有鹹魚。」先生便命拿上來。唐紹儀一邊用鹹魚下飯，一邊說

：「我大吃慣了。一只肥燒鵝，我一餐可以食完，因此家裏雖只有幾個人，每餐菜錢便要十元啊！」

有一次，伍廷芳、伍朝樞和唐紹儀幾個人一起來，先生留他們吃晚飯。伍廷芳說：「我每日喜食花生、甘薯、雞蛋和一些鮮魚，不慣食肉，還是讓我回家吃飯吧！」先生也不加以強留。

林煥庭某次來見先生，報告華僑匯款來的事情。先生說：「好！款存在你處吧！」有一天，先生、夫人和我到林煥庭處取了百多元，緩步走到棋盤街，走進一間舊書店裏，選購了一大堆線裝書。我將帶來的大包袱把書包好，但是太重了，不容易拿回去。我便對先生說：「可否雇一部馬車搬回去呢？」先生說：「好，這樣重的書籍背着是不好走的。」說着把手向衣袋一摸，又說：「錢已經買書用完了。」夫人也說身上沒有錢。先生問我身上有沒有錢，我說有四角錢，遂雇了一部馬車回去。先生隨即命林煥庭購置書櫥，並和夫人把書籍分門別類地放在櫥內。

先生有一次還帶着我雇了馬車到北四川路購了一大批外文書籍和制圖儀器等等。他常常繪制地圖，那裏應該築鐵路，那裏應該築公路，那條河流應該怎樣改良和怎樣利用，那裏有什麼礦藏那裏應該修建什麼商港和軍港等等，他都陸續詳細地繪出圖來。原有繪圖儀器很粗劣而且多有損壞因此又購了一批儀器回來。

上海有一名裁縫師名叫王亨利，先生到他店裏定製一套西服和一件大衣，並留下了地址，吩咐他製好了送來。不到三天，王亨利便把衣服送

來。他看見先生，必恭必敬，露出十分榮幸的樣子。夫人把價款給他，他不肯收受，一定要把衣服送給先生，表示一點敬意。先生自然不肯隨便要這幾件衣服。王亨利又誠懇地說：「些少敬意，請賞臉收了吧！這些衣服是我十分用心製成的。」先生覺得他如此誠懇，便點一點頭，表示接受。王亨利又說：「可否親筆寫『王亨利』三個字給我印名片？」先生便寫「王亨利」三個適合印名片用的字給他。王亨利萬分歡喜，拜謝而去。

謝謝你不用汽車了

上海永安公司大部份都是澳洲華僑股本，經理郭彪時常來拜候先生。有一次郭彪叫人送一件上好的毛皮大衣來，我轉報先生。先生驚訝地說：「上海不算十分冷，回廣東更不冷，我又不到北方去，我不受他的，你拿回去還給他吧！」我便拿了這件皮大衣，找着了郭彪，對他說：「中山先生多謝你，但皮衣先生不需要用，命我送還給你。」郭彪只得收下。隔兩天，郭彪又來訪。中山先生對他說：「永安公司生意十分好，獲利甚巨，希望能夠將賺得的資金拿來辦工廠、辦實業，並希望你們也能號召各地華僑拿出更多的資本，回國開辦工廠、農場和興辦各種實業。你送給我的皮大衣，我不應收領。如果是永安公司送的，永安公司是股份生意，也不可拿股東的錢來送禮。如果是你送的，更不應該。你把這大衣賣給外國人，可以獲得厚利。我的衣服足夠禦寒，更不需穿這樣華貴的大衣。我對你的誠意十

分感謝。」

上海先施公司經理馬應彪、大新公司經理蔡昌同爲香山縣（即中山縣）人，郭彪對他們說：「孫中山先生爲中國唯一的偉人，又是我們的同鄉，你們爲何不去見見他呢？」馬、蔡兩人都十分希望能見到中山先生，只是沒有機會。後郭彪用電話找我，說馬應彪、蔡昌同希望能來拜見先生，請先生給他一個日期，我接電話後便轉報先生，先生說：「我每日都開會，有暇時再通知他們吧。」

某天，一位美國中將請先生到他住所晚餐。先生雇了一部馬車，着我跟隨，按時前往。將近到達時，忽然壞了一個車輪，天又下起大雨來，車中只有一柄雨傘，便由我撐着雨傘遮着先生，冒着大雨前去，雖然路途不遠，但衣履都濕透了。我跑到門前把電鈴一按，沒有人開門。停了一會，再按一下，有人開門了，但只開了一道縫，向門外張了一張，便又把門關了。我從短牆上望見一個外國人站在台階上向外面張望，遂用英語對他說：「孫博士來了。」這個外國人才跑下台階，開門讓先生進去，並和先生熱烈握手，表示歡迎。進門後，門房問我孫博士是什麼人，我說：「孫博士你也不知道麼？他就是孫文。」這人驚奇地說道：「原來就是報紙上常常登載的孫文，他爲什麼不坐汽車來呢？到這裏訪問的人沒有不坐汽車的，剛才門鈴響，因沒有聽到汽車響聲，我還以爲是頑童作弄，所以沒有開門。」我騙他道：「原來是坐汽車來的，但到了街口汽車壞了。」餐後，美國中將送先生出門，並準備用汽車送先

生回寓。先生說：「謝謝你，不用汽車了，我還要到離此不遠的地方找一位朋友。」這位主人十分恭敬地送先生出門，握手告別。這時雨也停了，先生便步行回寓。

有一次我跟隨先生步行至愚園路，他忽然指着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對我說：「你看！愚園路這一帶地方，以前都是墳墓，現在都是華麗的洋房了。這些洋房都是我國軍閥築的。他們割據地方，橫徵暴斂，開烟賭，無惡不作，吸盡民脂民膏，來到這裏蓋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飲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農民都吃不飽，穿不暖，這樣，中國還能不亡國？所以我們非打倒軍閥不可。」

有一次，先生偕同夫人、陳少白、李謀之和黃大偉夫婦從上海乘火車到杭州西湖遊玩，我和黃惠龍跟隨護衛。先生戴白通草帽，穿白夏布長衫，攜手杖，還戴上深色墨晶眼鏡，以免惹人注意。到了杭州下車時，忽有警士三人時前時後地跟着走。先生帶同各人來到李謀之的別墅「李庄」，兩個警察又跟踪而來。我問他們有什麼事情，他們說：「我們是來保護貴人的，我們已有一個警士返區署報告了。」我便入內對先生說：「有兩個警察從車站跟着我們來到這裏，說是要來保護貴人的。」先生說：「蠢仔！有什麼『貴人』？」說畢便跑到門前對警士說：「警察職務是維持地方治安，我是一個平民，爲什麼跟來保護？快回去執行你們的任務吧！」正說話間，杭州警察廳長率同警士十人前來保護。先生吩咐他不要告知別人，並叫他們從速回去，先生在杭州玩

了三天，才回上海。

每逢端午、中秋、國慶和新年，總有一百幾十個人先先後後地來拜候先生。那些人多數都口口聲聲說，他們從前追隨過先生革命，把私人的財產弄光了，現在不特沒有好處，而且生活十分困難，請求先生資助。先生識透這些人生活實際上並不困難，不過是假冒對革命有功，企圖騙取資助而已。有一次有五個這類人來，裝起愁眉苦臉對先生說，幾天沒有飯吃了，請求幫助些生活費。先生說：「你們肌膚豐滿，面色紅潤，而且衣履齊整，那裏像幾天沒有吃飯的人？我每天雖然吃三餐，氣色還不及你們豐潤呢。」他們知道先生不可欺，便告退了。以後我因爲每逢年節，都有這班無賴來囉嗦，便約同黃惠龍對先生說：「我們打算以後不讓這些人進來，把他們驅逐出去，好不好？」先生答道：「其中也有真的爲革命出過力，而且生活確是困難的。不可這樣做，我不會感到麻煩的。」

革命軍一個打一百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四日，先生回到上海。過了好幾天，林伯渠和李大劍來見。又隔幾天，林伯渠、李大劍介紹蘇聯特使越飛來訪先生。先生與越飛相見之下，極爲喜悅，當即與越飛在樓上客廳開始會談，孫夫人、林伯渠和李大劍亦參加，一連整整談了六天。在這期間，先生吩咐我，無論何人都不許通傳和不許登樓。過了幾天之後，林伯渠來，我問他前幾天會談的是什麼問題，關防爲什麼要這樣嚴密。他告訴我，這次談的是

關於蘇俄幫助中國革命、打倒軍閥的問題，要我保守秘密。

我跟隨先生回到上海後，仍舊住在莫利愛路，薪水十分少，每天只領取零用二角，因此生活要特別節儉，衣服也是自己動手洗濯。有一天，夫人在樓上看見我在下面洗衣服，叫我上樓對我說：「朱卓文之女密報說，你受了陳炯明港幣二萬元，準備暗害先生；並說你已把此款在港買了洋房。起初我已不大相信，後來我見你常常自己洗衣服，不像是個受了人家一大筆錢的人，就越發使我不相信。現在我把這事告知你，你不要懷疑，好好地幹！」我說：「我不知這事，莫說二萬元，再多到算不出，我也不會受人家唆使的，請夫人放心。」夫人說：「不用你說，我一向知你誠實可靠。」

伍學焜、伍于簪、楊西岩和孫科自香港來見先生，報告陳炯明在廣東搞得十分壞，廣東同胞無不恨之刺骨。他們認為趁此時機下令討伐，必可成功。他們又表示願盡力籌劃經費。先生遂分別派員向駐福建的許崇智、李福林各部，駐兩廣邊境的楊希閔、劉震寰各部、駐湘粵桂邊境的譚延闓、朱培德、沈鴻英各部，和西江一帶的粵軍傳達命令，叫他們各率所部分頭向陳炯明攻擊。他們奉到命令，都切實執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便把陳炯明驅出廣州和西江、北江一帶地區。陳炯明率殘部分別退回東江惠州、潮梅、汕頭一帶和南路瓊崖各地，負隅頑抗。

先生以廣州已收復，遂和夫人自上海乘郵船取道香港返粵，黃惠龍和我跟隨侍衛。郵船到了

香港，港中各行商、知名人士和香港大學都紛紛開大會歡迎。先生忙個不了，每次大會都演說數小時。在香港大學歡迎會演講的時候各歡迎者熱烈鼓掌，頻頻高呼「孫博士萬歲！」我還大略記得先生說「……我從前在香港讀書，康德黎老師很喜歡我，我也十分敬重他，師生感情極為親切。後來我轉到檀香山讀書，適他也到該地遊歷，道上相逢，邀我同車四處遊覽。這時我頭上還拖着辮子。而今已隔數十年，回憶起來，當時情景還一一如在目前。……當我在香港讀書之時，中國人不曉得西醫，更可以說中國沒有西醫。我學醫不是謀個人的利益，而是志在救世，更借行醫以暗中革命，推翻滿清帝制，恢復中華。在我開業行醫時，診金多少不論，貧者更贈醫贈藥。此時廣東省城和澳門都沒有西藥房，因此我常常到香港採買西藥。……各位無論研究何種科學，學成之後，首先要以濟世為目的，為國家為民族效力。……」在散會時，「孫博士萬歲」之聲震耳欲聾，各歡迎者還一齊擁上來，把先生團團圍住，高高抬起，從大禮堂直抬至休息室，又紛紛環請先生題寫紀念冊，以留紀念。

先生於一九二三年二月回到廣州就任大元帥職，設大元帥府於廣州河南士敏土廠。有一天，李烈鈞、楊希閔、劉震寰、朱培德和許多高級將領都在座，先生對幾位參軍、副官、衛士隊長說：「你們試試槍法給大家看看！」言畢即率各人到網球場，在短牆上排列五只瓦鉢作靶子，命各參軍、副官等用手槍作短距離射擊，每人以五發為限。馬伯麟首先發射。他手持駁壳手槍，一連三

發，擊碎了三個瓦鉢，但後二發沒有擊中。參軍那耿寶用駁壳手槍一連擊中了五個瓦鉢。外籍副官馬均也中了三槍。我用大號左輪手槍，從左邊第一個瓦鉢依次向右射擊，把五個瓦鉢都打得粉碎。黃惠龍中了二發。姚觀順中了三發。最後是盧展柳，五發也都中了。射擊完後，先生向大家說：「各人的射擊技術都很好，雖然有些不能完全命中，但如果靶子大一些，就可以槍無虛發了。革命軍要有一個打一百個的精神和技術，我希望全體革命軍人都能達到這樣的程度，這樣，革命就會很快成功。」夫人說：「從前在越秀樓抵禦陳軍和保衛我脫險，衛士們都是有這樣技術的。」先生又問楊希閔、劉震寰等各高級將領，有沒有認真訓練部下實彈射擊。他們都說子彈補給困難，要求大元帥今後多撥給一些。先生當時曾命黃昌谷把此次實彈射擊的情形筆記下來。

先生在大元帥府把越秀樓殺賊獎章頒發給衛士，所有各總司令、軍長、司令如朱培德、譚延闓、楊希閔、楊震寰、李烈鈞、魏邦平等許多高級將領，以及大元帥府各級官佐全部都參加。越秀樓殺賊的衛士自大隊長姚觀順以下六十五人首先列隊到場，全場所有武職人員一律穿着整齊軍裝，儀式十分隆重。先生即席訓話說：「我自致力革命以來，經過了不知多少次的大小戰役，但從來沒有領過獎章，這次算是第一次。這次衛士隊能以六十五人抵抗賊軍千餘人，血戰一晝夜，殲滅賊軍數百人，而且還能安全撤退，沒有一個陣亡，實為戰爭史上所未有。你們都是革命軍的好模範。現在陳炯明負隅頑抗，必須加以討伐，

凡我革命軍人都應該仿效各衛士越秀樓殺賊的精神，迅速掃平叛逆。一訓話畢，夫人親自把獎章掛在各衛士的襟上，全體衛士均十分興奮，認為這是無上的光榮。

有一天，伍學焜、伍于簪、楊西岩、楊仙逸偕華僑十餘人來見先生，魏邦平夫婦亦在座。先生與各人略談了幾句，便招呼大家到門前碼頭，登上大南洋電船。吩咐開往鼎湖山。原來他們都是事先約好的。船開行後，先生和各人一面瀏覽沿途景物，一面暢談。約五六小時即到達高要縣屬羅隱浦，登岸步行約十分鐘至慶雲下院。僧人備山轎，先生不用，步行而往。各人因先生步行，也只得徒步相隨。至半山亭休息約半小時，繼續登山至慶雲寺。寺僧合十出迎，竭誠款待，晚齋后，開精舍留客。先生與各人暢談建國方略和北伐大計，至十一時始就寢。翌日早齋後約十時，先生偕各人至鼎湖寺遊覽後，循着原路回慶雲寺山門外。先生偕同各人步行下山，轉向飛水潭。這裏有大瀑布從山上直瀉而下，分上下兩級，上級淺而狹，下級深而廣。先生獨自一人跑到上級大瀑布之下洗澡。我見他身子浸在水裏洗滌內衣，便上前說：「先生，把衣服給我洗吧！」先生說：「不用，不用！我自己來，你以為我洗得不够乾淨嗎？」他把衣服洗完，才叫我到夫人那邊把內衣褲拿來穿好，加上外衣，然後下來與各人一同下山，至下午九時三十分，始返抵廣州二沙頭頤養園。

先生親自督師討伐陳炯明時，有一次率同各

衛士，偕顧問鮑羅廷到最前線——惠州城外之飛鵝嶺，指揮炮兵使用剛虎門運到的要塞炮向惠州城賊軍轟擊。一連發了十炮，逆軍既沒有還擊，也不敢對飛鵝嶺作爭奪戰。後來楊仙逸在東江河面用四艘大民船臨時裝配炸彈炸藥，準備轟炸惠州城。先生偕顧問鮑羅廷下船視察，看見炸彈炸藥製造成功，十分快慰。視察完畢，即偕各官佐上陸。詎料離船不到二十丈遠，忽然轟隆一聲，只見烟燄冲天，波濤洶湧，四艘大民船已被爆炸得無影無踪。先生流下眼淚說：「楊仙逸遇難了！」及回到大元帥府，夫人得知此事，也流起淚來。黃埔造船廠廠長蘇從仙，也在那次遇難。其爆炸原因，據說是拋棄烟頭不慎，引起炸藥爆炸所致。

親自救濟痲瘋病人

先生督師東征陳炯明，前後三次。但因楊希閔、劉震寰等不肯認真作戰，不僅遲遲不能殲滅陳賊，甚至還有許多次遇到危險。有一次逆軍楊坤如率部大舉來襲，我軍紛紛潰退。適樊鍾秀率豫軍約一旅趕至增援。先生問樊有何需要，樊說：

「一概都不要，說罷一口氣吃了四五隻饅頭。時葉恭綽在座，對樊說：『我願獻一萬元以備裝將軍轎車。』樊連說：『不用，不用，不敢領受。』言畢即忽忽上陣率部直衝陳軍。陳軍原以為勝利在握，忽被樊軍縱橫衝殺，遂自相踐踏，四處奔潰。此一戰役，雙方都受重大損失，造成以後相持狀態。先生以此役樊鍾秀功最大，特任樊為豫軍總司令。

有一天，先生稍有餘暇，命我跟隨僱小艇渡河，乘汽車至東山戴恩賽家找盧夫人。我在門外等候，約一小時餘，先生的女公子（盧夫人所生，戴恩賽之妻）送先生出來。先生登上汽車，命開至黃花岡，在烈士墓前憑弔。有一個年約三十歲的痲瘋病人來到先生跟前跪下求乞。我見他太接近先生的身子，急忙喝他跑開一些。先生說：「不要吆喝他，你是人，他也是人，他患了痲瘋病，無法謀生，十分淒慘。」說畢又問這人的家庭狀況，父母是不是也患痲瘋。這人說：他的父母都在東莞耕田，還有弟妹，去年他獨自來廣州謀生，結識了一個少婦，不料同居了幾個月，他的痲瘋就發作了，被她驅逐出來。說到這裏，這個人便頻呼肚子痛，拉開短爛的褲子疝瀉起來。先生伸手打算替他診脈。我急說：「他膿血遍體，萬不能接觸。」先生把手收回後，問我有沒有帶錢來。我回說只有二角子。先生命我將錢給他，又問他住在那裏。這人說住在伍廷芳的墓門。翌日，先生命李祿超辦函把這痲瘋病人送往石龍痲瘋院。

先生偕同夫人和朱培德、馬超俊、李祿超、黃大偉等許多人到白雲山巡視，我和黃惠龍跟隨侍衛。汽車至沙河墟，被農民發覺了，備山兜紛紛來接。先生一向是不坐轎的，婉謝了他們，率領着各人緩步前進。約一小時餘，至白雲寺，寺僧出迎，請留午齋。先生婉謝，轉至寺旁九龍泉休息，囑衛士們取出牛奶、餅乾、蘋果、與各人共作野餐。先生與李祿超等談，白雲山土質甚佳，傾斜角度亦不甚大，較為平坦之處適宜旱作，

可以種植雜糧，斜度較大的地方可以造林。餐畢與各人直登最高峯，虎門、長洲各要塞，廣三、粵漢、廣九各鐵路，石井兵工廠，廣州附近的河流、田野和鄉村，均歷歷在目。先生用望遠鏡四處看看，向馬超俊詢問石井兵工廠的狀況甚詳（此時馬任兵工廠廠長）。忽有幾十個農民跟踪而至，衣服破舊，一望而知他們生計困難。先生對他們說：「我剛才所見山下附近的鄉村，不是茅棚便是泥牆小屋，可以料定你們的生計是不充裕的。這原因都是地權制度不好，耕田的人每年要付出很大的田租，這個問題我一定要把它解決。白雲山各處的土質都甚佳，可以大加開墾，多種旱作物，高粱、包粟、落花生、大豆都可以種。同時也可以造林，多種松、杉、苦楝之類。請各位回去宣傳鼓吹，切實進行，不過數年，生活必可以得到豐裕。」各農民聽了之後都說：「大元帥的指導，我們一定要照着去做。」接着高呼：「大元帥萬歲！」

走路去講三民主義

有一個時期，陳炯明在惠州石龍一帶進擾，來勢猖獗，大有威脅廣州之勢。沈鴻英看風駛帆，把駐在北江和韶關一帶的部隊秘密向廣州移動，準備響應陳炯明。先生事先接到情報，命滇軍范石生率部防守北郊和大北門、越秀山、小北門一帶戰線。當沈鴻英實行叛變，率領集中在廣州北郊石井墟一帶的部隊向廣州急進時，先生立刻率領黃惠龍、我和幾十名衛士渡過珠江，乘汽車直上越秀山五層樓。沿途看見小北門、越秀山一

帶的滇軍並沒有作戰準備，連守衛和崗哨都沒有佈置。先生進入五層樓，望見范石生躺在床上吸食鴉片，三個勤務兵一齊動手燒烟裝斗，還是供應不上。先生登時震怒非常，指着范石生說：「范軍長，我已命你警戒這一帶地區，現在敵人已迫近了，你不特全無準備，並且絕無察覺，如此將置軍法于何地？」范石生正在吞雲吐霧，忽聞有人向他大罵，抬頭一望，才知道原來是孫中山先生，登時手足無措，慌慌張張地爬起來，作立正姿勢，行一鞠躬禮，但身子仍然不住地顫動。先生高聲說：「馬湘，你立即率領各衛士拿這裏的機槍去佈置陣地，聽我指揮。」我大喊：「奉大元帥命令，取機關槍殺敵。」隨即取了范軍的輕機槍三挺、重機槍二挺，至五層樓西邊至大北門一帶城牆上，選擇了地形和射界，佈置好了陣地，等候先生命令。先生步出五層樓，在城牆上用望遠鏡探視，黃惠龍和幾個衛士持手機關槍隨着，范石生也跟隨在後面。此時范石生的部隊已知道了大元帥和范軍長親自督戰，都佩好武器，紛紛趕到，坐下的坐下，臥倒的臥倒，準備作戰。沈鴻英軍先頭部隊大約有二三百人，快步前進，進到距離大北門約七八百米突，便紛紛蹲下，放了一輪步槍。先生見敵人蹲下，也把身子臥倒。這時敵人的子彈紛紛從上空掠過，呼呼作響。先生十分謹慎地用望遠鏡注視敵人的動作。敵人放了一輪槍之後，又紛紛起來向大北門急進。及至敵軍進到距離四五百米突時，先生忽然站起來，大叫「快放！」登時五挺輕重機關槍，二十幾挺手提機槍一齊劈劈拍拍響了起來，滇軍的步槍

、機槍也接着開了火。各衛士個個都是一等射手，槍無虛發，一輪猛烈的火力立刻把敵人壓倒了。幾百個敵人死的死，傷的傷，逃跑的跑不到幾十步也倒了。敵人的後續部隊也紛紛潰退，行伍大亂。先生看清楚了這些情況，遂高叫：「范石生，你立即率部追擊，不許敵人有喘息機會，一定要把敵人消滅。」范石生振起精神說：「我盡力去幹，不敢再負委任。」言畢，對他的部屬說了一些話，便帶同衛弁和千多名官佐士兵，從大北門向三元里急進。先生態度安詳，在城牆上時時用望遠鏡細心觀看。不及兩小時，敵人已敗退二十餘里。不久范石生以軍用電話來報：石井墟已克復，俘獲敵兵敵械不計其數，現正向殘敵窮追。先生遂率領衛士們返回大元帥府。

滇軍第一師師長趙成棟在第一公園行結婚禮，事前來見先生，請先生作證婚人，得到先生應允。到了那一天，趙把中央公園的結婚禮堂佈置得異常富麗堂皇，所用一切器物無不極盡豪華。先生進入客廳坐下，接着楊希閔、劉震寰等高級將領都進來了，紛紛向先生敬禮。先生有些不耐煩，催促趙成棟舉行婚禮。婚禮完畢後，先生即起身告辭說：「我因公事極忙，不能參加盛筵了。」趙成棟懇求稍待，一面吩咐開席。先生說：「不能，不能，公事急需處理。」趙成棟不敢再說，只得送先生登車。翌日，趙成棟派員送一百元席金來，先生放在辦公桌上，沒有理會。過了一個月後，我對先生說：「趙成棟送來的席金還在台上呢。」先生說：「你拿去，我不要。」我又說：「先生用來加菜好麼？」先生很不耐煩，甚

至帶着一些怒氣：「你拿去，你拿去！」

先生在一九二四年，每星期都到廣東大學講演三民主義。有一次剛到北岸步出碼頭時，見一婦人坐在堤邊哭得很苦，大家都沒有理會她。先生走上前去，看到這個婦人抱着一個面黃肌瘦、大約有四五歲的小孩，衣服也破爛得很。先生問她為甚麼哭得這樣淒苦。婦人說：「孩子病了十多二十天，沒有錢醫病，看看將近要死了，叫我怎不傷心？」說完又痛哭起來。先生伸手替她的病孩診了診脈，對婦人說：「你不要哭！小孩的病雖然重了一些，但脈搏、呼吸都還好，不會死的。」說完我打電話告知廣東大學醫科附屬第一醫院，請他們派十字車把這婦人和病孩載往留醫。他吩咐完畢。才到廣東大學去講演。

先生每次到廣東大學講演三民主義，都是從河南士敏土廠大元帥府乘坐電船渡江，然後再乘汽車前往。同行的人有秘書黃昌谷和副官衛士等十多人，需用汽車三部。有一次先生回到大元帥府，吩咐副官把庶務請來，問他每次到廣東大學講演，往返的汽車費多少。庶務回說：「每往返一次，三部汽車共計要一十五元。」先生說：「往返路程不到五華里，便付出車費十五元，花費太多了，以後不必用汽車。」從此以後，先生每次到廣東大學講演三民主義，都是率領着副官、衛士等步行前往。

廣州人有很多都認識先生，原因是先生每星期到廣東大學講三民主義時都是步行，而且時間和所經過時道路都有一定。因此，知道這種情形而又希望瞻仰先生儀容的人也就越來越多，先生

所經過的街道，常常兩旁都站着許多人。有一次，有一個約八九歲的孩子，滿身骯髒，在馬路上跑來跑去。一個衛士見這個小孩阻礙着先生前進，便跑上去把小孩推開。先生面上馬上露出不愉快的顏色，回到大元帥府後，叫這位衛士進來對他說：「剛才回來時，你把路上小孩推開，這是極不應該的，我自然會讓開這小孩，小孩怎能阻礙我走路？他年幼無知，倘若把他推到，更要使我難過，以後不要這樣做了。你可把我的話報告隊長，叫他命令全體衛士注意。」

有一次，先生在廣東大學講民族主義，因為禮堂不大，聽眾又多，加上天氣又熱，因而有許多聽講的人十分疲倦，有的還睡着了。先生為提起觀眾的精神，便串出一個故事說：「我少年的時候在香港讀書，看見了很多苦力工人聚在一起，談得十分起勁，有的哈哈大笑，有的搖頭嘆息，還有些不管旁人談話，聚精匯神地賭博。我覺得奇怪，大笑的是笑甚麼？既然有人大笑，為甚麼同時又有人嘆息呢？便上前問個明白。有一個苦力說：「後生哥！你讀書好了，知道我們的事於你無益。」又有一個說：「我告訴你吧！我們有一個行家，辛辛苦苦地積蓄了五塊錢，買了一條馬票。我們都是沒有房子住的，住在騎樓底下。他便把馬票藏在日常用來挑東西的竹槓裏，用爛布塞住槓頭，人不知鬼不覺，既不怕被人偷竊，更不會遺失。他把馬票的號碼牢牢記着，安心等候開獎。後來馬票開獎了，中頭獎的正是他，便喜歡萬分，以為領獎之後可以買洋房，做生意，這一生再也不用這根挑東西的槓子討生活了，

便把這根槓子狠狠地向大海裏一丟，跑到售馬票的商店探問領獎的手續，店員告訴了他，並叫他拿馬票到指定的銀行提取獎金和開戶存款。這時苦力才猛然想起馬票放在竹槓，便拼命跑到海邊去，希望把竹槓尋回。可是那裏還有甚麼影子呢？我們笑的是笑他錢還未到手就把竹槓丟了，還帶有幸災樂禍的思想，嘆息的是可惜他一個現成富翁做不成，是帶有同情的思想。現在我們這位行家因刺激過甚，神經十分錯亂，到現在還沒上工呢。」先生說完了這個故事便接着說：「民族主義就是這根槓子。」聽講的人聽到中山先生所講的故事後，果然都大笑起來，再沒有人打瞌睡了。

大元帥衛隊六個人

一九二四年六月中旬，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先生蒞臨主持，主席台上有廖仲愷、李濟深、周恩來、鄧演達、蘇聯顧問鮑羅廷、加倫等人。幾百個學生穿着整齊的軍裝，個個精神煥發。先生在開學典禮講話中說：「在十幾年的革命事業中，既取得了成功的經驗，也取得了失敗的教訓。中國革命所以遲遲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沒有自己的革命武裝，沒有廣大人民為基礎。現在無論那一支軍隊都是假借革命之名，實行割據之實；只知爭奪地盤，截留稅款，開煙開賭，以擴充實力，並沒有真正為革命效力的思想。現在為了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所以我才下定決心改組國民黨，建立自己的革命軍隊，誓把革命進行到底，這就是創辦黃埔軍校的宗旨。希望大家發奮圖強，好好學習。」

一九二四年春，陳炯明勢窮力蹙，退據廣東的東江，不敢再作進窺廣州之想。先生乃派出得力部隊東征。同年初，先生督率湘、滇、粵、桂、贛、豫、川、陝各路大軍，出師北伐，設大本營於韶關南華寺。豫軍總司令樊鍾秀請增撥戰械，願率所部作前驅。先生允其所請，樊遂率部奮勇直前，入江西，過湖北，經河南進至陝西。

顧問馬蘇（東莞人，以販賣中國舊畫至外國為業）至大本營，聽到副官馬均（加拿大籍，猶太人）說：「大本營參軍處由我指揮，副官處由我指揮，祕書處也是由我指揮。」馬蘇很驚異，找我談這事。我說：「那裏有這一回事？馬均不過是一個少尉副官，每個月支薪水三十元。他這樣吹牛，定有其他企圖，在外招搖撞騙更是意中事了。請你有便把這事向大元帥說明。」不久馬蘇對先生談起這事。先生聽了之後沒有甚麼表示，第二天軍需處把馬均叫了去，給了他三百元，並對他說：「大元帥叫你另尋職業，不必再來工作了。」從此以後，馬均就一直沒有再見到先生。

北洋軍閥張作霖派代表徐光漢，段祺瑞派代表許世英，先後到南華寺大本營來見先生，邀請先生到北京共商國是。先生遂決定北上。

先生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離開廣州，十七日到上海。這時有某軍閥派凶徒多人，準備在碼頭上行刺，被民智書局職工所探悉，向我密報，我遂與黃惠龍等多人，在先生步出輪船時持槍前後左右擁護；登車後又持槍分向前後左右警戒，同時派護軍使盧永祥，亦派有大隊軍警在碼頭一帶佈防拱衛，因此並沒有發生意外的事情。

先生到上海後，招待新聞記者和老革命黨人開會演說，發表談話，整天忙個不了。先生在上海停留約兩星期，然後乘船經過日本，前往天津。夫人、戴季陶、黃昌谷隨行，我與黃惠龍跟隨侍衛。輪船抵日本神戶時，日本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百多人前來歡迎，一致表示願輟學歸國聽先生驅策。先生勉勵了他們一番，並囑他們用功研究軍事學科，將來回國為國家出力。他們還打算公宴中山先生，先生叫他們不要浪費時間和金錢，辭謝了他們。第三天，日本各界人士和學生共千餘人，在神戶大學禮堂開歡迎大會（日本皇族沒有參加）。先生演講達四小時餘，聽眾頻頻鼓掌，情形十分熱烈。翌日，日本知名人士頭山滿、山田、荳野長知等以及先生在日本時認識的七八位友人先後來見，稍作敘談即告辭退出，只頭山滿一人留下，由下午九時起一直談至天明。頭山滿選用電話請了一位日本大財閥（忘其名字）到來，介紹與先生相見。這位財閥對先生執禮甚恭，頭山滿表示這位財閥能幫助中國建設，建議先生回國被選為大總統時聘他為顧問，中國建設事業就不患無資本，又表示他誠心希望中國富強，中日互相幫助。隔了一天，先生帶領副官、祕書等搭長崎丸回國。

十二月四日，長崎丸到達大沽口時，趙超、劉維熾、李仙根、孫科、孔祥熙、宋子文等十多人來接。到天津時，學生界搭大牌樓歡迎，先生當即對學生們演講。先生和一班隨從人員都住在張園。到天津後第三天，張作霖派員來說，在天津行轅舉行歡迎大會，請先生蒞臨。先生帶同我和

黃惠龍前往，和張作霖會談了四小時。翌日，張作霖到張園來見先生，一連來了二十輛汽車，衛士足有百多人，戒備十分森嚴。張作霖向先生表示，他決心追隨先生，並說他願作先生的衛士隊長。我和黃惠龍、劉彥華、趙超各人都站在客廳階前，張作霖的衛隊也有十多個人，和我們站在一起。其中有一位戴着上校肩章的軍官問我說：「孫中山先生的隨從衛士有多少人？」我回答說：「六人。」他聽錯是「六營」，覺得很驚奇，伸出指頭問我說：「一、二、三、四、五、六？是六營？駐在那裏？」我覺得他這個樣子實在可笑，便再說明是六個人，不是六個營。他又很詫異，覺得人數太少了。他看見我佩着一枝銀色的新式手槍，便請給他看。我說：「大元帥有命：『武器不能給人家看』，對不起了。」他又問這種新式手槍能抵敵多少人。我說：「一發可以擊斃十人。」他沒有露出懷疑的樣子，好像很相信我的話。

最後喝了一口參湯

先生從廣州到上海，由上海經過神戶，由神戶到天津，每到一處，不是招待記者，便是出席歡迎大會，或與各地知名人士會談，尤其是與頭山滿、張作霖的談話，所費時間更多。先生稍有餘暇也不休息，還要讀報紙，由於忙碌過度，在張作霖來訪之後，便生起病來。那時請了一位德國醫生替先生診病，每天服藥，注射，一連八九天都不見效。到了年底，先生為了急於與段祺瑞、張作霖等各人會商召開國民會議問題，不顧身

體健康，扶病到北京，住在北京飯店。先生到北京之後，病勢加重。當時大家商議，擬送先生到俄國醫院就醫。先生以俄國醫院設在東交民巷，不願進去，因此仍在北京飯店，每天都請德國醫生來看病。過了十多天，先生病勢有增無減，轉到協和醫院就醫，孫夫人同往，又請中醫施今墨診治，也沒有見效。過了半個月，進行割治。在施手術時，只限四人進入手術室，這四人是鮑羅廷、孫科、孔祥熙、宋子文。我在門外聽到先生說：「不怕痛，開刀吧！」開刀後發現肝臟滿佈白點，鮑羅廷主張把白點割去，醫生不同意，仍把傷口縫合。經過開刀後，夫人看到先生的病勢實在危險了，不住地流淚，問醫生先生需要經過幾小時才醒。醫生說要二十五小時。我在手術室外面用小凳坐着，等候先生醒過來。醫院的看護不允許，只得站在門外守候了一天一夜。先生醒了以後，剛好馬超俊到來，我請他暫時守衛，自己回去吃飯，洗澡，稍事休息。天剛亮，我又急急到來，和馬超俊等輪流站着守衛。李石曾煎了幾次人參湯給先生喝。過了十天，先生問醫生：「我究竟患了甚麼病？幾時才可以痊癒？我也懂得醫學的。」醫生答：「請孫博士寫遺囑吧！」各人聽了醫生的話，覺得先生的病已危在旦夕，於是用電話通知孔祥熙、孫科等速來醫院，又請俄國醫生再來診斷。各人到了之後，決定用十字車送先生至行轎，由孫夫人、俄國醫生、協和醫院護士和我四人擁送。下車時，因先生傷口未愈，不能過於震動，遂由我用雙手把先生托起，慢慢地從車上送至床上。護士整理床上潔具，交

我洗滌。我見先生排出的糞便其色甚黑。張靜江看見了問我，先生每日吃的是甚麼？我告知他先生每日只吃牛肉汁，都是由我到協和醫院取回來的。有一次，先生要吃葡萄，但這時葡萄甚少，我乘着汽車幾乎找遍了北京城，才買了一些回來，先生只吃了二三枚，就不願再吃了。何香凝每天都來慰問孫夫人。過了三天，夫人對我說：「先生命你進去。」我遂到先生床前站立。先生說：「我雙足痲痺得很，抱我起來坐坐！」我說：「先生傷口未愈，不可起來啊！」說着就傍着床沿跪下，把先生的左足放在肩上慢慢地按摩。按摩了一些時，先生睡着了，我又替先生按摩右足。天將亮了，先生醒來，對夫人說：「我一定要死了，馬湘一生跟隨我，必須養他過世，教育他的子女到大學畢業。」再過了三天，到了三月十一日的晚上，我又進到先生臥室，這時先生、夫人和護士都睡着了。到夜深三時，先生醒來，呻吟不絕，並且不斷地喊着：「同志啊！繼續我的主

義！」我看見先生這樣痛苦，於是叫醒了夫人，又把人參湯給先生喝。到翌日早上六時，汪精衛來看視先生的病，握着先生的手說：「先生！我是精衛。」接着何香凝、宋子文和俄國醫生都進來了。這時客廳裏徐紹楨、李石曾、馬超俊、張靜江等很多人在座，段祺瑞也派許世英代表前來問病。許世英來至先生臥室門外，行最敬禮後恭敬地說：「大總統！段執政即要來見。」先生就在這時死了！孫夫人見先生死了，痛不欲生，何香凝等一直不離左右，扶持勸慰。先生在病中已有十幾天沒有理髮，我遂將理髮匠林耀光請來，替先生遺體理髮。林畏縮不前，我向他解釋說：「你跟先生担任理髮，時間已不少了，接觸也慣了，又不是陌生的人，為甚麼生時不怕，死了就怕起了呢？待我用棉被靠着他的背部，用手扶着他的頭部，你來動手吧！」他起初還是勉強操作，但後來也就不怕了。夫人將剪下的頭髮用玻璃盒保存起來留作紀念。（摘自辛亥革命回憶錄）

近代中國史

（包括現代史）

大專學生及準備各種考試適用
張效乾教授著

定價：每冊新台幣三十五元特價二十五元
經銷處：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民書局
如直接函購請寄台北市泉州街九巷六號
郵政劃撥二六五八號著者帳戶（匯費免收）